

新经济方法

长城智库方法论

王德禄 主编

新经济生态论



新经济机会论

企业爆发式成长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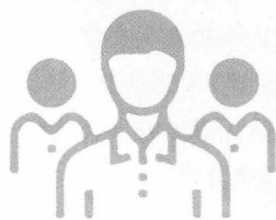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新经济方法

长城智库方法论

王德禄○主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经济方法 / 王德禄著 .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2018.9
ISBN 978-7-5155-1720-9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企业管理 IV. ① F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3440 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 未经合法授权 ,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新经济方法

主 编	王德禄
责任编辑	李 涛
特邀编辑	周 礼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720-9
定 价	6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391966
投稿邮箱	balimist0213@163.com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邮编 : 100102

序一 造钟者而非报时人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非常擅于播报时间，通常是看一眼太阳后马上播报：“现在是2017年11月14日9点33分12秒。”此人有着惊人的能力，堪称报时的天才。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建造了一座时钟来报时。相比之前，报时者未来将会逝去，而建造的时钟将会一直存留，即使建造者已不在。

这个类比的故事，出自宾夕法尼亚大学艾伦·查尔斯·科尔斯教授的“思想史与牛顿学说革命”的课堂上，而正是了解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简称“长城所”）的成就以及学习长城所的理论，让我回想起这个故事。

走进长城所办公室，准确地讲，是办公区，我被眼前的情况迷住了：宽敞的区域排列着约200张办公桌，分析师们都在桌前忙碌着，他们非常专注，走路不会打扰到旁人，整个办公区域沉浸在安静而繁忙的氛围中，而堆满了材料的书桌又类似教授的书桌，整个区域像是一个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融合。

王德禄所长与合作伙伴们于1993年创立了长城所，彼时中国的经济即将开始20年的快速扩张与腾飞，许多地区和企业都在积极寻找着发展的机会。长城所将目标定位于企业的成长，尤其是私营企业，以及协助一些地区意识到自身极高的增长潜能。“事实上，我们的客户都实现了高速发展的目标”，王所长曾这样告诉我，同时长城所也在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科技园建设导向性政策的规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王所长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已成功地将长城所从一个拥有10余人的团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350人和全国6个战略分支机构的全方位咨询企业，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成就。“事实上我们成长得很慢”，王所长这样讲道。除了表示谦虚，王所长这样说也很中肯，他解释道：“在中国，咨询并不是最赚钱的行业，像房地产、金融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利润丰厚行业存在巨大的经济回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有许多机会进入这些行业可以让我们非常富裕，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投身于我们热爱的事业：推动中国科技发展、通过运用一系列我们为中国市场研发的有效的咨询方法来帮助企业和区域发展。”

王所长和其他合伙人从事科技咨询的坚定信念，对一家咨询公司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希望通过企业和区域咨询工作以影响政府和社会，帮助将科技带入中国。此外，

长城所的创始人们并不希望仅通过几个聪明点子来帮助企业和区域，他们希望发展一套方法论，来系统地、持续地帮助企业和区域发展。他们是在造钟，而不仅仅是报时。

经过20多年的研究、实践与改善，长城所建立了三个核心方法：80/20/4创意法则、长板理论和头脑风暴法。下面我简单介绍这三个方法：

80/20/4创意法则基于帕累托80/20法则，即80%的产出源自20%的投入。长城所将其进一步扩展为80/20/4——长城所认为，在重点的20%的投入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关键的4%的投入。该法则帮助长城所辨别客户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咨询界，“短板效应”是众所周知的分析方法，它指的是水桶的容积取决于组成水桶最短的一块木板，以此来比喻组织机构的战略能力取决于该组织的薄弱领域。有意思的是，长城所把这个比喻颠倒过来——企业应该发展“长板”扩大自身优势，而不是补充“短板”。为获得爆发式增长，企业应当投资优势领域，把长板做长，而通过外包等资源整合方式来支撑其他方面的运行。

头脑风暴法作为一种产生新思想的方法，自20世纪中叶起就被西方成熟经济体的企业所接受并广泛运用，但在中国却还很新且面临阻力。长城人很早就认识到头脑风暴法的潜力，而且明白中国人拒绝它的原因：对中国人来说，创造在哲学上意味着单个思想者对内在灵魂的搜寻。产生新思想的中国式途径是个人的深度思考，而西方人对外人更加开放也更习惯于不相互批评地自由交换意见。长城人在哲学层面对东西方差异的揭示使他们得以系统、清晰地把头脑风暴法运用到工作中来帮助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创新。

长城所是最早关注“新经济”的机构之一。新经济是基于知识和创造力的经济，而不是基于有形货物和生产制造。长城所很早就坚信，随着新技术的进步和世界范围内经济体的融合，新经济将取代旧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现象。考虑到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在制造业（旧经济）中的成就，我必须承认长城所确有远见。长城所据此帮助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一道，抢抓新经济与全球化到来的机遇。

在我们的谈话中，王德禄所长自豪地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分析框架的三个层次：企业、产业、区域。由于推测我会提及哈佛战略家迈克尔·波特的“三级范式”，王所长笑着说：“我们的模型借鉴了他，但比他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把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融合了进去。”

最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波全球化可能正在遭遇历来最强的阻力，体现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些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失败者的成熟经济体中的投票人强烈声讨全球化。但是，从全球化中退出并不能使失败者成为成功者。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贸易伙伴、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我认为长城所在缩小企业、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之间的差

距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对于我来说，长城所确实是咨询行业的钟表制造商，在咨询领域，什么是“钟表制造商”呢？拥有超越利润的眼光、能够使人们获得新知识，开发新方法，并将新知识和新方法系统性、有组织地在工作中运用。

钟表制造需要时间，而告知时间提供即时满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很多机会的快速增长市场中，“告知时间”尤其吸引人，并且能够得到报酬，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在一种快速赚钱的社会文化中，长城所信奉和追求的东西值得称赞。他们忙于为热切的客户完成项目，他们悄悄地制造钟表，即使在他们的制造者已经离开之后，他们未来的钟表制造工作也依然在进行着。项目可能成功或失败，人才可能来来去去，但长城所创始人的信念仍然存在，像发条一样系统地指导组织。

李少民^①

2017年11月

^① 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教授，同时也是杰出学者，是2008年弗吉尼亚州联邦颁发的杰出教师奖得主。

序二 知行合一的方法创新

一、知行合一：探索新经济咨询 25 年

今年是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成立 25 周年，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回顾长城所这些年来所从事的新经济咨询，恰好响应了中国新经济的萌芽与崛起。在这个过程中，长城所意识地开展了大量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对方法论的研究是长城智库长期坚持的探索成果。同时，鉴于王德禄个人的经历、阅历、知识结构的影响，长城所也擅于在咨询实践中找到理论依据或创造新的方法。

从全球来看，在咨询领域开展方法研究，既是知名跨国咨询公司的传统，也是智库机构创造和传播新知识的使命。中国人最早谈方法论，是在“五四”时期。当时胡适说中国人是“目的热、方法盲”，即“我一定要这么干”，“急功近利”。所以胡适反复强调方法，把科学的方法论带入中国来的是那一代人中的少数，是这一批搞实验哲学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纵然胡适反对“目的热”有其道理，但是由于救国救亡的民族大业在方向上、道路上尚处斗争之中，其推行的“方法论”自然逐渐下沉。直到 80 年代，在结束“文革”、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建设纲领之后，“方法热”才再度兴起。中国人意识到在大方向既定的背景下，“方法”是解决问题、实现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长城所开展针对新经济的方法论研究，初衷来自王德禄矢志不渝的初心。80 年代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工作时，他负责做“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专栏，还研究过原子弹社会史、科学与和平问题。后来他始终关注着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的关系等核心问题。在创办长城所后，对于科技政策研究涉及的诸多问题，包括科学的自主性、科学的建制、科学普世价值、科学奖励、科学评价等，王德禄总是从科学史、科学哲学中寻找理论支撑与研究方法，从而成了新时期研究并践行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基于多年深入的研究与新经济实践，王德禄提出：硅谷是原子科学的产物，中关村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从硅谷的诞生来看，很重要的人物是布什的博士生特

曼博，而当时的布什、康普顿都是原子科学家。在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科技园区这些重大战略则是宋健、李绪鄂这些管理与研究大科学、有大视野的人提出的。可以说，80年代初中国拥抱新技术革命也恰恰是改革开放40年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而中国探索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在系统论的框架下演进的。因此，长城所研究方法论的思想起源是科技哲学（或自然辩证法），得益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从科学技术向外伸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其核心是关注技术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这正是新经济孕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长城所25年来所坚持的新经济咨询和理论方法创新，正是对自然辩证法、科学学史的社会实践，可以理解为“知行合一”，知行相须，是一个探索和上升的过程。

二、格物致知：以方法创新引领未来

如果说西方经济管理理论成就了麦肯锡、波士顿等传统咨询机构的经典方法体系，那么长城所基于科学哲学思想独创的关于新经济的方法论，则可以归属于未来学研究范畴。未来学方法论的特点是从个案中洞见新趋势，并重视其前瞻性和对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提炼形成具有预测性的未来发展规律。未来学研究与实证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虽然没有严谨的数学公式和数据推导，但是仍具有科学性。

美国具有长期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能力，与未来学在其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美国的未来学研究是很有影响力的，不仅仅是对决策者，更在于很多创业者、企业家、发明家等都深受未来学思想的影响。在美国，如果对未来学家关于趋势的判断有所感悟，就会有人抓住这个趋势，去实践这个判断。所以未来学对人们的影响，是通过思想的引领来带动一些决策者和先进的创业者，跟趋势，抓机遇，率先实践，从而领跑于全球。当前的中国，已经走过了跟跑、并跑的阶段，未来要实现领跑，更需要一些未来学的眼光，来判断我们今后的走向。现在，长城所以25年来在新经济领域的实践基础，总结形成这一套带有未来学研究性质的新经济方法论，希望为中国新经济的实践者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引，并唤起中国思想界对于未来学研究的关注。

三、格致有序：长城智库方法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书是长城智库方法论研究成果的精选汇编，旨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在孕育发展新经济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也为下一个 40 年中国新经济发展实现全球引领提供适宜的哲学思想、科学方法和探索工具。

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前两部分“新经济三方法”和“创新驱动三方法”，分别解读了新经济孕育发展和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两套具有前瞻性、普适性和系统性的方法论，不仅指导了长城所关于新经济的其他方法研究，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探索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经验和方法的高度概括。第三部分精选了长城智库方法论研究的 13 个主要成果，既有对新经济方法哲学思想源头的探究（第七、八、九章），也包括“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区域宏观”三观结合的新经济咨询方法体系中的经典理论与方法（第十章至第十九章）。长城所的这一整套方法已在多年的新经济咨询中被反复验证、屡试不爽，是适合新经济的原创方法，也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需求的方法创新探索。

刘志光^①

2018 年 6 月

① 作者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目 录

序一 造钟者而非报时人	i
序二 知行合一的方法创新	iv

第一部分 新经济三方法 001

第一章 新经济生态论	003
第二章 新经济机会论	020
第三章 企业爆发式成长论	036

第二部分 创新驱动三方法 052

第四章 80/20/4：帕累托平方的创意法则	054
第五章 长板论	068
第六章 外脑式头脑风暴	086
附录 “创新驱动三方法”述评	108

第三部分 知行合一：新经济实践新方法 123

第七章 科学哲学与新经济	125
第八章 洞见：战略能力的新要求	137
第九章 概念设计法	155
第十章 众创空间：创业试错的新舞台	167

第十一章 瞪羚企业：新经济的产业引领者	177
第十二章 独角兽来了：新经济爆发成长现象	194
第十三章 产业价值链运动三规律：分解、融合、新业态	217
第十四章 全球链接与全球创新地图	241
第十五章 分享经济：经济发展新范式	266
第十六章 平台经济：新经济发展引擎	284
第十七章 GEI “互联网+”路线图	299
第十八章 新经济条件下如何挖掘区域个性	315
第十九章 高新区区域辐射带动模型	335
后 记	349

第一部分 新经济三方法

在现代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经济领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我们称之为“新经济来临”。面对新经济，必须用新思维、新方法来认识、理解新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然后才有可能遵循新经济的内在规律，把握新经济的运行。长城所提出：新经济生态论（第一章）、新经济机会论（第二章）和企业爆发式成长论（第三章）是认识、理解和把握新经济运行的三个基本方法。

新经济生态是新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新经济内生动能的最佳体现。《硅谷生态圈》一书的作者维克多·黄和格雷格·霍洛维茨称：“要了解硅谷，我们必须将它里面的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来考虑，而不是仅仅将他们想象成个体的总和。”换句话说，硅谷的创新能力和成果，是产生于“能够允许新物种出现、资源循环、原子重新组合的富有生态系统”。

长城所提出：新经济生态由创新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组成，同时结合实践总结提出了创新创业生态的“3+3+3”模型。其中，第一个“3”强调：“创业是生态的发生器”，创业的数量和种类越多，即新物种出现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生态；“研发是生态的赋能体”，即研发创新与创业结合，就会使生态具有高能量；“服务是生态的黏合剂”，即服务机构的种类越多，创新与创业成功的概率就越高，从研发到市场价值实现的进程就越快，生态也越趋向成形。第二个“3”强调：在生态中，人、资本、技术三大创新要素不断循环，它们是生态的活力物质流。这三大核心要素在持续快速的循环中不仅能实现自身指数级的增长，而且会带动其他各类要素纷纷进入生态运行，为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第三个“3”强调：生态中发挥支撑作用的是其内在的机制和相应的环境，若没有自由的文化、灵活的机制，纵然有全部正确的元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成功的创新；国际化的宜居环境则是吸引、留住、用活创新第一要素——人才的必备条件。进一步看，创新创业生态的持续发展

一方面会催生跨界的新业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还会吸引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聚集，并逐渐衍生出新的产业生态。创新创业生态是新经济发展的源头，产业生态是创新创业生态持续发展的结果，两者共同构成新经济生态。

新经济机会论是“偶然性”范畴的延伸与扩展，其核心是将“机会”看作是社会发展规律中一种内在普遍的、本质存在的必然成分，而不是“补充形式”。“机会”的这种自然本体的本质特征，在新经济到来之前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并不明显，然而当下全球正处于“无规则可循的大颠覆时代”（《麦肯锡说，未来20年大机遇》），变化无常与不确定性已成为常态，人类经济发展就如同自然生态中的“最有前途的生命形态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一样（《硅谷生态圈》），“机会”的出现更加偶然，但也更为频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更有价值。长城所提出的新经济机会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发现机会、识别机会、把握机会，通过对机会的把握与合理运用来实现各类主体的价值倍增和爆发式成长。

企业爆发式成长论颠覆了以往经济形态中企业的线性增长路径，指出：当下有一批企业在产业生态自组织演进的状态下，呈现出一种指数级的非线性成长路径。在这种路径下，企业生命周期出现“创业—瞪羚企业—独角兽—龙企业”四种跃迁式成长阶段；并具有“合伙、跨界、平台、生态圈、自成长和引爆点”六大爆发式成长机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条路径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在于：根植于繁荣的新经济生态环境，能抓住依赖于洞见所获得的重要机会，并且能够在海量的创业试错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实现爆发式成长。

在新经济三方法中，生态论是基础，它认为人类经济社会是一个生物系统，而生物系统背后的法则与所有生命系统背后的法则是一致的，它要求我们像认识复杂的自然生态演进一样去认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演进的规律。因此，它要求政府部门不是控制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的特定创造过程，而是要营造能够允许新生事物出现、创新资源不断循环、内生性创新机制不断完善的生态系统。机会论是关键，它是对当下社会发展自然本质特质的再认识，因而也是各类主体对客体规律把握的关键，抓住了机会，就抓住了新经济条件下发展的关键。爆发式成长论是结果，是新经济生态中，技术路线及创业的多样性通过海量试错竞争，获胜者取得的结果。因此，注重创新创业的多样性和企业的成长性而不是创业成功率和企业规模，是当下政府部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要义。

第一章 新经济生态论

【所长专栏：新经济生态是一流园区崛起的根本】

发展新经济是时代要求，这不仅是旧动能的演进升级，更是新动能的原创培育。新经济生态是创新驱动经济的成熟形态，是新动能内生性的最佳体现。构建新经济生态，是培育壮大新动能，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是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要求；是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区域崛起、换道超车的关键路径。我国科技创新进入了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阶段，在未来，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新动能越强、新经济生态越成熟，将越有助于持续性领跑的实现。

我们认为，新经济生态包括创新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创新创业生态是新经济发展的源头，产业生态是创新创业持续发展的结果。基于对全球创新、创业和高成长企业的持续观察，我们提出“创新创业生态 3+3+3”模型，即三核心、三循环、三支撑。三核心为“创研服”：创业是生态发生器，研发决定创新创业浓度，服务黏合研发和创业。三循环为人才、资金、技术三要素的循环，大学、企业、政府构成三螺旋组织体系加速促进创新要素循环的形成。三支撑包括自由文化、灵活机制和国际宜居。自由文化是创新生态的能量源，灵活机制是生态适应性的核心表现，国际宜居是生态建设的重要保障。

创新创业生态的产业包容性很强，各类跨界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当产业跨界越来越频繁，随着代表生态化趋势的平台型企业加速出现，专业化的产业生态便会逐步形成。平台型企业等产业组织者通过构建产业生态，推进所在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是产业组织者在进行产业选择。当原创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涌现时，产业生态基本形成，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便显现出来。

政府培育新经济生态，首先要培育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其次要支持产业组织者借助智库的力量做出产业选择。在新经济时代做一流科技园区，核心是打造能涌现瞪羚、独角兽以及平台型企业的新经济生态。对于一流园区，不在于企业的数量有多少、规模有多大，出现伟大的企业才是最重要的。以创新创业生态为源头的新经济生态，成为当前这个时代培育伟大企业的关键。

王德禄

2017年8月28日

1.1 基于自然生态和复杂科学的新经济生态

1.1.1 自然生态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 E·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初次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953年,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提出生态学研究自然结构及其功能,以生命物种为对象,研究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生态论是在生态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论,是以生态观来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一般方法。1923年,莱奥波尔德就已经从生态学的视角将地球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萨克塞曾指出“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部分”。由此,生态理论演变为一个普适性的方法论。

经济活动是自然生态在人类社会的映射。人类经济活动具有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特征。经济活动中的创新主体,既具有个体多样性能开展多种创新活动,也能够通过联结创造出更加多种多样的产业组织,如同自然生态中的物种,是生态系统中的基本组成单元。创新产业集群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种群,按产业的技术领域划分创新种群。创新群落包括研究者、开发者、应用者三大群落:研究者如同自然界的生产者,生产新知识;开发者如同自然界的消费者,应用新知识开发出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应用者如同自然界的分解者,消费新商品和服务,同时提出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独角兽就相当于自然生态中的优势种,对于抵抗外界的干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瞪羚到独角兽及其衍生企业的发展,就如同自然生态中生物个体的成长和繁衍,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类比为生态群落演替。自然生态中当两个生物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某环境变量时,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企业之间的竞争如同生态位重叠,企业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它们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就越大,竞争就越激烈。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能量流、物质循环和信息流三大生命体征。人类经济活动的生命体征可以归结为创新循环,即包括思想的作用构成的能量流,人才、技术、资本组成的物质循环,以及创新信息交换组成的信息流。价值链、产业链如同自然生态的食物链,保持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的创新循环。

新经济背景下经济活动生态特征越来越强烈。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创新驱动作用更加显现,创新要素循环流动更加频繁,创业主体呈现爆发式成长。创新全球化纵深推进,多种要素交互影响、各类领域交叉融合,各主体不再单独而孤立地存在,每个主体都在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形成各主体间良性循环和互动的链条。

企业更多采用联盟、外包、合作、战略投资等方式整合资源,进行双向的、多边的互动,形成共生共荣的生态圈,目的在于用己所长、采集众长,实现协同创新和互利共赢。于是,创新种群和群落开始出现,新经济生态得到构建。自然生态系统依靠不同物种间的互利和敌对等多样化的关系来调节生态平衡,生态系统越复杂,生物的个体数越稳定,越容易维持多样性。因此,新经济发展越成熟,新经济生态系统越复杂,经济活动的“生态性”越强烈。

1.1.2 复杂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是随着人类对生物、经济及社会活动研究的深入应运而生的一门从系统结构和功能角度研究客观世界的交叉性学科。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是科学史上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复杂性科学研究经历了埃德加·莫兰的学说、普利高津的布鲁塞尔学派、圣菲研究所的理论等三个主流发展阶段。目前复杂性科学已形成观点纷呈的繁荣局面,主要流派包括比利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德国哈肯的协同学、德国艾根的超循环论等自组织理论、美国圣菲研究所以盖尔曼与霍兰为代表的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中国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

经济活动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生态系统。经济活动的不可控变量较多,各种因素交互影响而多次出现混沌现象和随机性现象,用传统的方法无法把握。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经济领域传统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理论能更深刻地认识新经济生态呈现的特征。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多元素、多层次、多功能,系统行为变化无常但又有一定的规律,而系统总是通过自组织、自适应等复杂过程向高级状态演化。所谓的复杂生态系统就是一个由大量相互作用的不同单元组成的自适应系统。现代经济系统作为一个不同主体参与的、开放的、具有信息反馈功能的系统,其中的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都受到其他经济因素或过程的影响,不是孤立地发生或存在。各种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经济活动是一类重要的、典型的复杂生态系统。

运用复杂性科学理论深刻认识新经济生态。新经济生态是一个多目标、多变量、多层次的综合体,各目标之间存在着复杂性,各变量相互耦合,各层次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网络。各主体彼此竞争又相互依存,产生更加错综复杂且具备不确定性的整体系统行为。在新经济生态整体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内各主体和集群不断衍生出新的创新主体和集群,从而实现非线性增长。瞪羚企业爆发式成长,一部分发展为世界级大公司,之后产生原创新兴产业,这种质变不是简单要素叠加的结果,而是各主体通过非线性作用由低级向高级生态演化,这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

特征体现了新经济生态的涌现性。新经济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各主体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信号，自发调节内部结构和竞合关系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从而保持平衡态并产生新功能。

相对于传统经济体系，新经济生态是创新驱动的经济活动衍生出来的成熟的经济形态。传统经济体系类似机械制造，是由工业主导、要素驱动的规模经济。在传统经济体系中，企业呈现小微—中—大—大—中型—规上企业的线性增长，看重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投入，是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体系。新经济生态类似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最强、稳定性最高的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极快。多样、偶发、复杂、自组织是生态繁荣的特征，同样也是新经济生态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在新经济生态中，围绕多元创新形成多种类型的企业、研发机构、中介，如同热带雨林中丰富的物种、群落，体现出多样性。最具前途的企业常常超预期出现，体现出偶发性。各主体间创新关系错综复杂，如同热带雨林中复杂的群落关系。新经济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能够自我供给、循环、修复，体现出自组织性。

我们认为，新经济生态包括创新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从新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创新创业生态体现出源头作用，具有强大的内生动能。当创新创业生态持续发展，渐渐衍生出产业生态，对社会发展具有产业化和规模化的影响。因此，产业生态是创新创业生态的重要结果，体现出经济属性。“任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都有赖于方法的突破与创新”，所以我们立足这一思想，提出“新经济生态论”，助力各类创新主体在新经济背景下，洞见机遇、把握机会，实现爆发式成长，最终形成共同繁荣的新经济生态。

1.2 新经济生态源头：创新创业生态

新经济生态源头是创新创业生态，我们结合理论与实践提出创新创业生态“3+3+3 模型”，即三核心、三支撑、三循环。三核心即创业、研发、服务，其中创业是发生器，研发是赋能体，服务是黏合剂。三支撑是自由文化、灵活机制、国际宜居。三循环是人才循环、资本循环、技术循环。

1.2.1 三核心：创业、研发、服务

1.2.1.1 创业是生态发生器

创业数量越多、平台型企业越丰富，越有可能形成生态。在众多创业类型中，高端创业、跨区域创业、硬科技创业最容易实现爆发式增长，催生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瞪羚和独角兽群体中平台作用越突出的企业越容易激发内部创业，继而衍生创业企业。